

# 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 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吴瑛 乔丽娟

**摘要：**国际共识经国际组织而传播，可以借助国际组织提升中国声音的国际影响力。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西方国家“制造国际共识”的传播机制包括：通过取得世卫组织高级职位和“金主”角色奠定话语主导权，形成基础共识；通过组建精英群体联盟和开展新闻批评，形成程序共识；将西方中心主义与反共意识形态融入组织逻辑，构成政策共识。针对西方国家通过国际组织谋求话语霸权的现实，中国要和世界各国一起发出声音，推进“重构国际共识”，这包括：推动平衡国际组织各国人员比例与资金投入，重构基础共识；推动传播主体从精英群体向多元话语网络转变，重构程序共识；在强调国际公共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基础上开展精准传播，重构政策共识。因此，要将国际组织打造成多种声音并存的平台，在发出中国声音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进程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国际共识；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声音

**中图分类号：**D813；D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21) 11-0028-12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1.11.004

**作者简介：**吴瑛，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乔丽娟，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上海 201620）

国际组织是世界权力博弈的平台，也是多种声音竞争的场域。然而，当前大部分国际组织是二战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重大国际问题发生时，西方国家往往以国际组织为平台，通过一套显著或隐晦的“制造国际共识”的机制，抢占话语权制高点，引导国际舆论，进而谋求西方国家的利益。

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是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协调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世卫组织提出对中国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以响应某些西方国家的“实验室病毒源头论”。此外，“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疫苗外

收稿日期：2021-09-03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身份的建构与认同：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分析与反思研究”（项目编号：20YJAZH106）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社会科学 2021年第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交”等也是西方国家以世卫组织为平台制造的“共识”，不仅损害了中国形象，也误导了国际社会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认知。本文以世卫组织为例，将研究时间设置为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卫组织至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对世卫组织文件和国际媒体报道的分析，试图分析西方国家如何通过基础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共识来“制造国际共识”，继而引导国际社会有关世界卫生治理的议程。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国际共识”的中国方案，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推进“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 一、共识与制造共识

### （一）共识的概念与源头

共识的英文是“Consensus”，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的“con”（一起）和“sentire”（感觉）的组合，拉丁文的含义是“一个协定或共同情感”，它是“构成一个国家各部分间的普遍关联”，<sup>①</sup>在城邦中，人们的思想要高度共通。<sup>②</sup>在中国文化中，荀子肯定基于“类”<sup>③</sup>而产生共感的可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大同”世界的追求，蕴含着一定的共识思想。

共识的具体含义是指“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sup>④</sup>“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与共识不同，共识包含着一定的共通价值，而普世价值是以片面视角为普遍性方法的价值观。共识一般指认的是结果，而同意（Consent）表示赞同或应允，指认的是过程。共识表面看是认同问题，但实质却是利益问题，不同群体能否找到利益交汇点是寻求共识的关键。

西方的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表达了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基础上“同意的”共识。在18世纪，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思想包含了以上帝权威和自然法为依据的道德共识，在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那里，共识表现为以契约体现的全体人民的“公意”。<sup>⑤</sup>在19世纪，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假设社会中存在某种潜在契约，通过社会制度运作而获得平和与稳定。<sup>⑥</sup>在20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伊斯顿（D. Easton）、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等学者，从民主制度与共识的关系阐述了共识观念。<sup>⑦</sup>

在当代西方思想领域，对于共识研究颇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话语共识”和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的“重叠共识”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面临整合危机，解救的办法就是在交往中进行沟通，形成共识。哈贝马斯强调通过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与正确性对话取得共识。<sup>⑧</sup>哈贝马斯的话语共识侧重于语言及精神交往过程，使交往主体失去了物质性根基，难以避免空想性。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是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各学说的公认理念部分即“重叠共识”。<sup>⑨</sup>“重叠共识”即在承认现有观念存在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目标上却具有共识，通过交往形成“视域融合”。

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是否可能形成共识？多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共

① [英]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2—84页。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0页。

③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荀子·非相》）

④ [英]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⑤ 沈湘平：《价值共识是否及如何可能》，《哲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⑥ [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⑦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7页。

⑧ [德] 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曹国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⑨ [美]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识不可能存在，如蒯因（W. V. O. Quine）的“翻译不确定性原则”、库恩（T. S. Kuhn）的“不可公度性理论”等。<sup>①</sup> 更多学者认为，人类一直在追求价值的统一性：人类是一个整体，各方面性质相似，各文化充满共通性；人类历史的文明交往、文化传播和模仿正说明了某种共识存在的事实；当代全球传播网络为普遍经验和共识提供了可能。

目前，对于共识的研究更多围绕价值共识、政治共识、道德共识、正义共识、重叠共识等概念进行阐释，主要从政治学、哲学等视角开展研究。然而，共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在信息传播和交流互鉴中实现的，需要从传播学视角切入共识的形成机制，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权力因素的影响。

## （二）制造共识模型

共识是如何产生的？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传播不但是达成共识的方法，更是共识形成的结果，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构建了一个“制造共识”的理论模型，解释和批判美国媒体的共识制造机制。他们认为，美国媒体受制并服务于政府以及强大的利益集团，国家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制造共识”，实现思想控制，极力保护着整个国家特权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议程。

“制造共识”模型包括五个层面：一是媒体规模、所有权的集中；二是广告作为大众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媒体对政府、专家人士等信息源的依赖；四是新闻批评作为制约媒体的力量；五是把反共意识形态作为控制机制。<sup>②</sup> 作为思想控制的关键步骤，共识制造往往作用于无形之中，如谢·卡拉—穆尔扎（С. Кара-Мурза）所言，当某人想操纵群体意识，会供给群体一些符号，把符号联系的解释强加给群体，使其按照操纵者所希望的方向对现实加以歪曲。<sup>③</sup>

现存的新闻结构可以塑造、限制观众对于主要议题的阐释与理解，以影响国际形势。有研究发现，美国通过隐晦的宣传技巧控制伊拉克媒体，制造共识，使得伊拉克民众集体失语；<sup>④</sup> 有学者分析了1998年到2014年间西方媒体对委内瑞拉的报道，发现英美主流报纸在报道中制造了西方意识形态，报道态度负面居多。<sup>⑤</sup> 在国内，民调在公关和媒体的共同运营下，操纵民意，制造出表征客观但实质虚幻的“共识”；<sup>⑥</sup> 日本传媒将各种“社会议题”转化为“媒介议题”，并最终使其成为政府操作的“政治议题”，通过“共识动员”，塑造内部凝聚力和认同。<sup>⑦</sup>

社交媒体时代并不会影响这个模型的适用性。在乔姆斯基看来，社交媒体使得受众关注不到有可能激发不同意见的声音，点击功能通过议程设置完成有利环境的创建，资本主义成功在新媒体领域制造共识。<sup>⑧</sup> 例如，法国和澳大利亚主要通过网站宣传疫苗接种政策，还包括政府新闻发布会、专家访谈等不同策略，用以制造共识。<sup>⑨</sup>

前期研究对制造共识的运用仍停留在具体的国际或国内热点事件上，很少将该模型适用于国

① 朱玲琳：《社会共识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97页。

② [美] 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③ [俄]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宋嗣喜、王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④ Benjamin Isakhan, “Manufacturing Consent in Iraq: Interference in the Post-Saddam Media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raqi Studies*, Vol.3, 2009, pp.7-25.

⑤ Alan MacLeod, “Manufacturing Consent in Venezuela: Media Misreporting of a Country, 1998-2014”, *Critical Sociology*, Vol.46, 2018, pp.273-290.

⑥ 沈承诚：《民意政治还是民调政治：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造过程的分析》，《江汉论坛》2019年第4期。

⑦ 林晓光：《日本对华战略文化形成的社会舆论机制——“普通国家”的身份建构与媒体的“共识动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2期。

⑧ Jonathan A. Obar, Anne Oeldorf-Hirsch, “The Clickwrap: A Political Economic Mechanism for Manufacturing Consent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 Society*, Vol.4, 2018, pp.1-11.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⑨ Katie Attwell, Jeremy K. Ward and Sian Tomkinson, “Manufacturing Consent for Vaccine Mandate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in France and Australia”,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Vol.10, 2021, pp.598-602.

际组织，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平台。本研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借助制造共识模型，分析西方国家通过世卫组织生产话语权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如何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重构国际共识的战略与路径，为在国际组织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出努力。

## 二、中国参与世卫组织的历程

中国是世卫组织的创始国和最早的会员国之一。1945年，在联合国关于国际组织问题的大会上，中国代表参与提交的“建立一个国际性卫生组织的宣言”为最终创建世卫组织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世卫组织的历程包括四个阶段，即局外者、初步参与者、努力融入者和积极贡献者四个阶段。

第一，世卫组织的局外者（1949年至1972年）。从1949年到1972年，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地区所占领，在此期间，中国与世卫组织处于对立状态，基本上将其等同于西方反华势力。例如，世卫组织《疫情周报》多次将中国的海口、上海等港口“误报”为天花或霍乱疫港，中国60年代已消灭天花的事实直到1979年才被世卫组织认证。<sup>②</sup> 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及意识形态影响，中国没有机会在世卫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世卫组织的初步参与者（1973年至1977年）。1972年，第25届世界卫生大会恢复了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合法席位，中国自此结束了“局外者”身份。在第26届世卫大会上，中国代表首次亮相，孟庆玉介绍了赤脚医生的由来和现状，引起其他国家高度关注。1973年，《纽约时报》称中国代表讨论了疟疾等疾病的治疗方案，相信其加入可以为世卫组织作出贡献。<sup>③</sup> 瑞士学者发表文章认为，世界医学界应从中国代表有关“赤脚医生”的介绍中学习宝贵经验。<sup>④</sup> 在该阶段，中国在世卫组织的全球传播着力宣扬社会主义优越性，传播的重点内容并没有放在世界各国卫生技术交流和学习上，该时期的中国只是世卫组织的初步参与者。

第三，世卫组织的努力融入者（1978年至2003年）。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淡化意识形态影响，将世卫组织看作专业性技术机构，为各国提供医疗援助，制定国际准则。中国在该阶段承诺并完成世卫组织的指标性任务，但在“韬光养晦”战略框架下，借助世卫组织传播中国声音的意图并不显著。中国先后对基本药物目录、扩大免疫规划、消灭脊髓灰质炎和碘缺乏病等倡议作出承诺，并努力践行，成为实施世卫组织各规划项目的模范生。<sup>⑤</sup> 1998年，BBC发表文章称，世卫组织官员称赞中国在健康领域取得了卓越全面的佳绩。<sup>⑥</sup>

在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过程中，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国际社会及世卫组织批评我国早期防控不当，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信关系面临考验，致使中国国家形象受损。此后，中国主动回应，公开承认最初对疫情处理的失误，宣布积极配合世卫组织工作，参与全球疫情的预防与治理，中国的合作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分享信息更加及时透明。

第四，世卫组织的积极贡献者（2004年至今）。2006年，中国香港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国率先实现了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目标，2021年，中国正式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的认证。中国不仅积极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而且主动传播中国声音，努力成为世卫组织理念的贡献者。2017年，中国提出“健康丝绸之路”，2020

① 苏静静、张大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及早期合作（1945—1948）》，《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22644/WER5431.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③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ves into Central Position of Influence in WHO”,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1973.

④ S. B. Rifkin, “Public Health in China: Is the Experience Relevant to Other Less Developed Nation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 19, 1973, pp. 2149-2157.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⑤ 苏静静、张大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动力的技术转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期。

⑥ “World Health Authority Chief Praises China’s Health Work”, *BBC*, November 24, 1998.

社会科学 2021年第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年，习近平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创新主张，获得BBC的关注，“这表明中国愿意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抗击疫情”。<sup>①</sup>

当前，有关中国与世卫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进展、中国为世卫组织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中美在世卫组织的博弈。但前期研究缺少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对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的角色的系统性研究仍然匮乏。面对当前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上的垄断，本文以世卫组织为例，剖析西方国家共识制造的机制，并提出中国如何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推动重构国际共识的模型与要素。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世卫组织官网，收集了1972年到2020年中国参加的世界卫生大会、执行委员会和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会议文件144份，并搜集了该时间段国际媒体报道中国与世卫组织的相关英语新闻748篇，数据来自Factiva数据库。研究设置4个类目，对报道进行编码，类目及其信度值如下：时间为1.0，议题为0.87，消息来源为0.83，报道态度为0.79，达到了信度检验要求。

### 三、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制造共识”的机制

本文除了参考共识制造模型外，同时引入了考察共识的三个维度，即基础共识、程序共识和政策共识。美国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认为有三条途径可以达成民主共识：第一，终极价值，如人类都追求的平等和自由；第二，游戏规则或程序；第三，政府出台的政策。<sup>②</sup>伊斯顿（D. Easton）认为，以上论述恰好是共识的三个层次：第一，价值或信仰体系的共识，是基础共识；第二，政治制度层面的共识，是程序共识；第三，政府出台或制定的政策，是政策共识。<sup>③</sup>

乔万尼·萨托利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三个层面的共识含义：<sup>④</sup>基础共识决定着这个社会是否认同同样的价值观或追求同样的目标，基础共识决定了民主制度的成功与否以及最终共识是否可被达成；程序共识确立了如何运行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游戏规则，如果大多数人不认可或不接受游戏规则，那么共识没有被真正达成；政策共识是允许讨论的统治，共识的达成不是消灭异见，而是允许争论和反对派的出现，达成“异见”的共识（Consensus-as-Dissensus）。我们需要“异见”引起共识的变化，即带来新的共识。有学者在乔万尼·萨托利共识层面的基础上，对其意义进行了创新和延展：基础共识是达成更高层次共识的前提，包含自然资源、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等；程序共识是建立操作运行的规则；政策共识是具体层面的措施，直接影响利益分配。<sup>⑤</sup>

将基础共识、程序共识、政策共识这三个层面运用于传播流程中，则体现为国际组织信息传播的物质基础、信息流的操作引导以及信息的价值和目标。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制造共识的传播流程如下：首先，通过高比例的任职人员以及捐赠资金奠定了基础共识；其次，新闻来源中精英群体的联盟、新闻批评保持的“正确轨道”构成程序共识；最后，西方中心主义理念与反共意识形态融入政策共识。

#### （一）制造基础共识：人员规模与资金捐赠

基础共识是达成更高层次共识的前提。共识可以通过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两种途径达成，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扮演主要角色；在策略行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

① “Covid-19 Geopolitics: China Pledges Continuous Support for Ecuador”, *BBC*, June 17, 2020.

②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8页。

③ 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Ideas*, New York: Wile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④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8页。

⑤ 王忠勇：《哲学视域中的共识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159页。

社会科学 2021年第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sup>①</sup>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中，正是从策略行为出发，从任职人员及资金投入两方面入手，制造基础共识。

### 1. 高层任职人员：共识制造的“把关人”

权力、地位及各种职位上的现任者可以加强共识的渗透，使共识得到强化。制造共识模型认为，按照地位、资源等因素划分的顶层媒体机构是能够设定全国议程的“指挥部”。在国际组织中，也遵循同样的实力规则，其议程与政策不可能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体现的多是主导者的利益和价值。国家在某一国际组织领导层的任职人员比例大，则占有相对优势，可以推动其所关心的议程进入国际视野，而任职人员比例少甚至没有的国家，其所关心的议题可能会被边缘化。

国际组织中的高级职位一直是各国激烈竞争的对象，更有能力影响国际组织的国家，也更成功地使本国国民占据高级职位。<sup>②</sup> 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总部任职的领导人员占比72%，其中，美国任职人员最多，达20位，包括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斯图尔特·西蒙森（Stewart Simonson）和数据分析部门助理总干事萨米拉·阿斯玛（Samira Asma）。<sup>③</sup> 非西方国家任职人员只占28%，其中，中国人只有1位，即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任明辉。在世卫组织任职的全部中国人有40名，只占该组织员工总数的1%。<sup>④</sup> 世卫组织领导人员大部分来自西方国家，在议题提出乃至规则实施等领域居于优势地位。比如，世卫组织把加强全球传染病监测机制列为优先事项，而非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卫生能力建设。<sup>⑤</sup>

高层任职人员事实上充当了西方国家共识制造的“把关人”，使其在源头上就具有结构性优势，以微妙的权力形式塑造了世卫组织的对话性质与最终共识。尽管世卫组织官员是来自各国卫生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各自国家，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技术人员履行着和外交人员一样的职责。世卫组织强调招聘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向缺额国倾斜，然而因受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非西方国家在国际招聘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参与度和成功率均不高，仍处于边缘地位。

### 2. 经费和捐款：共识制造的资源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由于媒体重视为其提供资金的“金主”，“广告商从而获得了事实上的监管权威”，<sup>⑥</sup> 影响节目的编排。因此，资金和货币是制造共识的重要资源，世卫组织同样面临着相似的结构制约，西方国家是资金等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因而对世卫组织作用的发挥具有更大影响力。

世卫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西方国家不仅在自愿捐款方面名列前茅，例如，2019年，世卫组织的核心自愿捐款账户全部来自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瑞典、挪威、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丹麦、卢森堡、瑞士、法国、西班牙、摩纳哥，<sup>⑦</sup> 而且在会费缴纳方面也独占鳌头，尤其美国一直居于会费缴纳份额首位。综合来看，2020年世卫组织10个最大供资方中，西方国家及其资助的基金会占绝大比例，包括德国、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① [德]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② Paul Novosad, Eric Werker, “Who Run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ationali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4, 2019, pp.1-33.

③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s/about-us/who-hq-organigram.pdf?sfvrsn=6039f0e7\\_10](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documents/about-us/who-hq-organigram.pdf?sfvrsn=6039f0e7_10).

④ “Trump’s Decision to Pull U.S. out of WHO will Boost China’s Influenc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20.

⑤ Obijiofor Aginam, “Global Governance”, in Sandro Galea, ed., *Macr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Springer, 2007, pp.159-167.

⑥ [美] 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⑦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chedule 2 –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by fund and by contributor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9 (in US dollars) A. General Fund.

社会科学 2021年第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欧盟委员会、美国等，占规划预算的61%。<sup>①</sup> 中国虽然近些年在会费缴纳方面居于前列（2020年至2021年，中国缴纳会费占比12.0058%，排名第二），<sup>②</sup> 但在自愿捐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十大自愿缴款方上一直榜上无名。

由于世卫组织对捐款的分配使用秉承捐助者优先原则，大部分自愿捐款都有附加条件，项目的流向和优先事项的确定都要反映捐助者的偏好。<sup>③</sup> 这严重削弱了世卫组织的决策权，使得世卫组织的国际共识和议事日程受到西方国家政策偏好的影响。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职第一天就撤销了关于暂停每年向世卫组织缴纳4亿美元会费的决定，从而保持世卫组织最大会费缴纳者的身份，推动该机构按照美国意愿进行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财力不足、科技研究水平落后，对世卫组织的资金与资源贡献有限，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也长期处于“寡言”或“失语”地位。

## （二）制造程序共识：消息源精英联盟与新闻批评

程序共识指的是规则问题，现实世界中经济、政治等领域充满冲突、分裂，必须确立优先于其他规则的基础性规则，从而保证不同主体可以通过这些规则达成共识。在共识的传播流程中，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通过消息源精英群体联盟以及新闻批评保持的“正确轨道”来制造程序共识。

### 1. 权力与知识的精英联盟：共识的“扩散器”

西方国家政府通过高级别任职以及扮演的“金主”角色，奠定了在世卫组织中的地位，西方国家的媒体也通过在世界的舆论影响力先发制人，成为共识的“扩散器”。媒体报道中的消息源等同于看待世界的窗口，映射着多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媒体被相互利益关系等因素拖进了一种与势力强大消息源之间的共生关系。本文以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为参照，选取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7个西方国家的媒体样本。数据显示，这些媒体的消息来源，占比居前的包括：世卫组织官员（总干事、世卫组织发言人、世卫组织驻华代表等）占28%，中国官员（外交部发言人、疾控中心官员、国家卫健委官员等）占19.1%、国外官员（外国总统、外交官、卫生部官员等）占11.2%、国外专家（流行病学专家、传染病学专家等）占10.4%。

官方消息源具有清晰的身份标志和权威性，受媒体青睐，马克·菲什曼（Mark Fishman）称之为“与官联姻原则”。<sup>④</sup> 西方媒体经常借助世卫组织官员的评价来批评中国，以显示其消息的客观性，例如，2020年，《卫报》引用世卫组织官员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的讲话，称“和非典一样，我们不停询问中国，世卫组织基本从未从中国得到完整透明的信息”。<sup>⑤</sup> 强势消息源经常利用媒体对其的依赖，实现意见操控，使得媒体遵循特定的议程和框架。多数西方媒体的报道倾向于反面引用中国官员消息源，在《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承诺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后，便评论此举是为了转移中国是疫情起源地的注意力。<sup>⑥</sup>

此外，西方国家还吸收专家作为已有共识的“扩散器”，呈现出“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和知识的权力化”。<sup>⑦</sup> 专家因专业知识技能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可通过概念的创造、主题的阐释以及标准的设定产生影响。世卫组织在专门知识领域尤其依赖专家权威，西方国家经

①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4/A74\\_29-ch.pdf](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74/A74_29-ch.pdf).

②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9342/A72\\_R12-ch.pdf?sequence=1&isAllowed=y](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29342/A72_R12-ch.pdf?sequence=1&isAllowed=y).

③ “About WHO: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https://www.who.int/about/finances-accountability/funding/voluntary-contributions/en/>.

④ 参见 [美] 爱德华·赫尔曼、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⑤ “China Withheld Data on Coronavirus from WHO, Records Reveal” *The Guardian*, June 24, 2020. <http://www.cnki.net>

⑥ “China Reverses Course, Agrees to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Outbreak’s Origin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9, 2020.

⑦ Micha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Prison*, London: Allen Lane, 1977.

常利用科学技术领域的优势，占领话语权高地。比如，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表示，“实验室泄露论”存在可能性，<sup>①</sup>美国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指出，新冠肺炎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有着确定的可能性，<sup>②</sup>都在国际社会引起了重要反响。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用“互搭梯子”形容新闻场域与专业学者的关系。<sup>③</sup>科学家作为“带着任务的信源”，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普及科学而来。如果说在国内事务上，西方专家学者常以“独立性”和“专业性”挑战政府。那么，在国际事务中，他们则倾向于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与政府声音同频共振，以此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将特定阶层的信念、价值观、态度与行为准则变成共识，在国际社会扩散，“异见”声音则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边缘化。

## 2. 新闻批评：共识的“固定器”

新闻批评是指对媒体言论发表反面观点。如果新闻批评由规模较大且影响力较强的个体或机构发出，则会对媒体产生严重影响，使其遭受损失。在政治氛围和文化空气的长期规训下，媒体达成了哪些议题可能招致新闻批评的默契，因此，尽可能不触及“雷区”。新闻批评强化了权威在新闻发布中的管理作用，政府本身就是新闻批评的主要制造者，经常对媒体进行攻击、威胁和“纠正”等，试图阻止媒体偏离其设定的路线。西方国家也不时将新闻批评当作共识制造的“固定器”，不允许发表政府共识之外的观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之音（VOA）就曾在遭受政府批评之后，加大了对中国的污名化。美国之音是美国十多家对外广播台中唯一由联邦政府经营的电台，其经费、官员、新闻导向都来自美国政府，按美国政府意志行事。近年来，美国之音配合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在新疆、台湾、香港等问题方面屡屡发难。2020年3月31日和4月8日，美国之音分别发布了有关“美国死亡病例赶超中国”与“武汉解封，夜晚灯光秀”的新闻，随即4月10日白宫每日简报网站1600 Daily作出批评，“美国之音花纳税人的钱当中国政府的喉舌”。面对来自政府的新闻批评，美国之音急忙做出“纠正”，4月10日发表声明强硬反驳指控，对中国政府和中國官方媒体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量信息进行了“彻底的反驳”。

通过对报道文本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西方国家沿着既定的政府思想进行报道，凸显“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将中国与这两个流行疾病紧密关联。除了防止本国媒体偏离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某些西方国家还对世卫组织发布的违反其观念的新闻进行批评。由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多次赞扬中国公开透明的态度，特朗普称世卫组织偏袒中国，以“中国为中心”。德国默卡托研究中心（MERICS）更是发布了题目为《有中国特色的WHO？》的文章，<sup>④</sup>以此不断肃清反对声音和批判力量。这些新闻批评的声音限制了议题范围，使有损于其偏好和利益的诉求没有机会进入国际传播轨道，成为共识制造的“固定器”。

## （三）制造政策共识：西方中心主义目标和反共意识形态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萨（Christopher Osakwe）强调，“国际教育、文化或者科学合作问题的政治性毫不逊色，更不用说那些更敏感的国际劳工或卫生问题了”，<sup>⑤</sup>西方国家在世卫组织的政策共识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点以及反共意识形态色彩。

### 1. 西方中心主义：共识的最终目标

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国家将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看作二战后战胜国的红利，尽全力保持其

①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7252849>.

② <https://www.voachinese.com/a/yuan-zhiming-p4-lab-wuhan-institute-virology-biosafety-covid-19-origin-investigation-20210720/5973093.html>.

③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

④ <https://merics.org/en/analysis/who-has-chinese-characteristics>.

⑤ 参见 H. Ameri, *Politics and Process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 Gower: Hants House, 1982.

在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大力推崇西方中心主义的政策共识。西方中心主义尤其体现在国际组织出台的政策、国际议程的安排等方面。比如，世卫组织将全球传染病监测列为优先关注和解决的议题，而没有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基础卫生能力建设纳入优先事项，<sup>①</sup>正是对应了美国卫生医疗界的倡议。

一直以来，美国都非常重视传染病的应对和治疗：从小布什政府将防止传染病大流行纳入2002年和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并列为“优先议题”，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应对疫情和生物威胁”作为保障美国领土安全的三大支柱之一，<sup>②</sup>都体现了美国将传染病治疗纳入政策议程的决心。最为显著的是美国2019年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全面聚焦传染病议题，对艾滋病、饮用水清洁、母婴健康等世界重要的卫生问题并无提及，<sup>③</sup>全面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策共识。

在国际组织中，保持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政策共识是稳定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实现手段。在世卫组织，哪些卫生议题具有安全或战略意义大多数由西方国家界定，其真正担心的卫生风险是指威胁到本国利益的风险，而非政策如何影响全球疾病负担。因此，世卫组织的很多政策共识与国际议程都与西方国家自身需要有关，忽视了非西方国家面临的医疗资源不足、基础卫生保健不充分等问题，使后者成为西方国家卫生战略的“副产品”。

## 2.反共色彩：共识的意识形态

共识在建构过程中，还可能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变形或扭曲。意识形态借助权力和货币媒介，侵蚀理解主体的先见，共识不再成为多元主体理解的一致，而是意识形态整合的产物，是一种虚假共识。

西方国家媒体和非西方国家媒体有关中国与世卫组织的报道态度、报道主题等有很大不同。在所选样本中，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态度最多，占48.1%，非西方媒体的中立态度及正面态度总计为75%，负面态度只有25%。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关键词前五位都涉及“非典”、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台湾问题。然而，西方国家报道中提及“死亡”的频率高达883次，共识制造模型会把敌国的受害者看成“最有价值的受害者”，也就是便于叙事的对象，以此凸显中国疫情治理“不力”。与此同时，“特朗普”“病人”“中共”“批评”等词汇占比很大，与非西方国家突出“措施”“努力”“支持”“资金”等具有合作意味的词汇不同，西方国家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视为异端，报道呈现鲜明的反共色彩。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中国共产党会压制任何破坏稳定的事情，所以中国没有公开疫情。”<sup>④</sup>

在台湾地区加入世卫组织问题上，西方国家也呈现显著的反共意识形态，他们周期性寻求台湾地区在世卫组织中的“合法作用和声音”，称“台湾地区仅是想加入世卫组织以分享知识促进全球卫生健康，这也有错吗”。<sup>⑤</sup>西方国家媒体将台湾问题演变成为“体制问题”“民主问题”“人权问题”，设置种种话语陷阱，打造“共识”，利用貌似合理的逻辑和预设前提作为先发制人的话语基础。

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在世卫组织中的经济、资源、传播等多方面的累积优势，制造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共识，构建了强势霸权话语，诱导其他国家遵循其意志。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在历史进程中，观念退化为意识形态，词语取代人类现实，成功地控制人们，获得权力和影响，这不是例外，而是规律。<sup>⑥</sup>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

① Sandro Galea, ed., *Macrosocial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2007.

②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③ 晋继勇：《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3期。

④ “In China, The Coronavirus Crisis Tests the System of Bureaucratic Paternalism and Maoist Authoritarianism,” *Global Health Affairs*, January 27, 2020, <http://www.cnki.net>.

⑤ “Taiwan just Wants to Share in Health Facts”, *Deseret News*, June 21, 1999.

⑥ 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社会科学 2021年第11期 吴 瑛 乔丽娟：从制造共识到重构共识：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研究  
起，旧有的、由西方国家引领的国际共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可以借助国际组织平台，制定适宜的“中国方案”，在重构国际共识的进程中参与建构国际新秩序。

#### 四、重构国际共识和提升中国声音的影响力

共识是一个需要不断予以协调和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在基础共识层面，西方大国专心于本国官员任职和会费、捐款，忽视发展中国家在世卫组织的发展问题，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程序共识层面，过于注重精英群体的声音，在全球传播时代，点对面的辐射状传播被点对点的网状互动代替，精英群体权威性正在弱化，各国民间舆论在互联网上的发酵和传播之后，日益参与影响国际事件的走向；在政策共识层面，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策略，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陷入“逢中必反”“逢共必反”的意识形态困局，也忽略了世界意识形态思潮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共识传播正在面临新媒体时代舆论场的新语境、新形态和新特征，无法适应世界权力多元化和国际体系变革的需求。

##### （一）重构基础共识：平衡人员与资金比例

在一个混合体内，公共性和平衡性所占比重越大，则共识的认同性、稳定性越强。<sup>①</sup>只有国际组织内部的国家拥有平等的待遇和参与权，才更能意识到自身属于共同体的一员，对抗或冲突才会减少。重构基础共识，就是要平衡国际组织内各国人员比例与资金投入，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局面，提升国际组织资源分配的公共性。

一国在国际组织的任职人员数量和级别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以世卫组织为例，中国职员职级分布表现为高级岗位人数偏少，岗位分布表现为综合管理类部门人数偏少。因此，要加大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比例，提高任职层次，加强人才培养和输送。一是政府主导选拔和推荐人才，包括初级专业人才项目（JPO）、专业技术类人员短期借调作为输送职员的过渡方式。<sup>②</sup>二是为实习生到国际组织应聘正式职位争取实践经历。我国专门建立了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平台，推出了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三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召开的会议、论坛和对话等活动，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员的参与比例和级别。通过加强在国际组织活动中的参与度和曝光度，让非西方关切更多“嵌入”国际会议议程，促进国际共识的公平性和共享性。

资金系统是国际组织运行的基础，要加大对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让中国成为国际组织主要资金来源国之一，这对重构国际共识起到支撑性作用。各国都会为了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机会而博弈，如果一国所占有的资金比例不足，必然遭遇边缘化。中国近些年在世卫组织会费缴纳方面居于前列，但在自愿捐款方面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统计显示，世卫组织的自愿捐款占其所有资金来源的比例已从2002年到2003年的61%升至2020年到2021年的84%。<sup>③</sup>同时，面对南北公共卫生治理存在巨大差距的现实，中国应该更多顾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确保公共卫生资金和资源可以更为合理、公正地在世界范围内共享。

##### （二）重构程序共识

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认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在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每一个意志都对最后的认同发挥作用，共识就在无数的合力与认同中产生”。<sup>④</sup>在传播流程中，程序共识的重构需要将传播主体从精英群体转变为多元话语网络，将传播途径从重视新闻批评转变为多渠道发声。

① 李海青：《体现公民权利的民主程序：现代性价值共识达成的基本途径》，《云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王忱：《世界卫生组织的人才招聘模式与国际人才交流》，《国际人才交流》2020年第1期。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③ <https://www.who.int/about/finances-accountability/funding/voluntarycontributions/en/>.

④ Everett M. Roger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 1. 多元话语网络

在传统共识构建模式中，话语权的掌控者往往由精英群体组成，而普通民众被排斥在共识建构程序之外。在互联网时代，传播成为多元主体和多重话语相互联系、调适和内化的动态过程，国际舆论场存在多层次的话语互动和博弈。在重构程序共识时，不仅要重视政府官员等精英群体的作用，更要建立以学术机构、传媒、草根群体、非政府组织等为节点的立体多元话语网络。

在医疗卫生信息和观点的发布上，医疗界和专家学者比发言人和政要的发声更为有效。2020年4月，《外交学人》发表了百位中国学者联名的《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呼吁全球团结抗疫，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污名化，<sup>①</sup>得到了美国百位知名学者公开信的回应，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积极效果。另外，《纽约时报》关注张文宏在疫情期间的言论，称“张文宏既不代表政治也不代表意识形态，他对中国公众充满尊重，张文宏的人情味打动了群众”，<sup>②</sup>这样的个案就产生了比中国官员发声更好的效果。未来中国需要倡导宽松自由的舆论氛围，鼓励更多的专业意见领袖在国际组织中发表观点，主动参与和引导国际共识构建。

普通人的图像常常登上国际组织的官网。研究发现，无论是有关中国的专题报告还是主题照片，世卫组织都更加关注中国普通医疗工作者或患者。类似中国医生对患者望闻问切等日常工作照片展示了普通公众的真实信息，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共情。中国需要构建包括草根群体在内的多元话语网络，重视非官方及民间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复调传播影响国际共识的走向。

### 2. 借助多样渠道发声

共识的达成需要相互理解的语言规则和交流沟通的渠道保障，程序的公平和渠道的顺畅可以保证共识的真实性和充分性。除了构造多元话语网络，程序共识的重构还需要借助多样化的发声渠道。

首先，中国要积极借助世卫组织大会、执行委员会、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等国际会议，阐明自身的立场。在第70届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会议中，中国代表介绍了有关健康扶贫以及数字健康的经验，得到世卫组织和成员国的积极评价。其次，世卫组织内部设有媒体中心，负责发布新闻稿、简讯、评论、特写故事、图片故事等，中国官员和专家可以借助这些平台或《世界卫生组织简报》(Bulletin)、《流行病学记录周刊》(Weekly Epidemiological Record)等期刊和出版物，发表署名文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的跨国界、去国家中心化等特点，正在建构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影响着国际舆论的形成和舆论的导向”。<sup>③</sup>中国要紧跟世卫组织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动态，积极回应，并对热点事件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年轻一代的话语表达更具亲和力和创造力，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世卫组织和其他成员国互动和交流的主力军。国际共识重构还要警惕来自西方国家的社交机器人操纵的国际舆论，当前社交媒体的“人+社交机器人”的共生状态，正在改变特定国际舆论的走向。相关部门要积极进行事实核查，运用反谣言策略，狙击社交机器人对舆论的操纵，在营造和谐清朗的国际网络空间的进程中，重构国际共识。

### (三) 重构政策共识：公共属性议题的精准传播

政策共识涉及具体利益，关涉切实实体。政策共识应该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包容各方的多元偏好和差异视角，使拥有不同价值观的群体都能表达自己的诉求。在传播流程中，与西方国家围绕自身利益打造政策共识不同，中国重构政策共识的新支点是公共属性议题的精准传播，即选择基于共同利益的议题，根据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文化特色等进行精准传播。

①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4/academic-letter-to-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from-100-chinese-scholars/> 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210312/china-covid19-zhang-wenhong/>.

③ 张开：《新媒体时代国际舆论引导与国家安全》，《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中国可以选择拥有成功经验的议题，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本文通过分析西方媒体报道中国不同议题的态度，发现中国在治疗艾滋病和肺结核方面受到西方媒体的好评。对艾滋病治疗持正面态度的报道占36%，持中立态度的占46%，而对肺结核治疗持正面态度的报道占44%，持中立态度的占56%。“中国为艾滋病贫困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中国在艾滋病治疗方面进步巨大”，<sup>①</sup>“中国为全球肺结核病例2025年减半的目标作出巨大贡献”。<sup>②</sup>对此，中国要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宣传中国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和启发，在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经验的同时，重构政策共识。

在推进与发达国家形成共识的同时，要寻求与其存在的共同利益，且政治敏感度低的领域。近些年，中国在雾霾治理、禽流感防治以及医疗设施建设等方面，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比如，日本共同社消息称，“日本希望向中国派遣专家，学习禽流感检测和控制手段”，<sup>③</sup>中国可在此类议题上与发达国家搭建共有共享的国际话语空间。国际共识会通过具体的国际规则，内化到各国交往实践中，成为一种潜意识。<sup>④</sup>中国还可以通过提出新议题、打造新话语，融入国际规则创制，引导国际共识体系变革，提升政策共识的可接受度。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就超越了意识形态藩篱，超越了某些西方国家的本国优先论和零和博弈思维，为人类健康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价值引领。

## 结 语

寻求共识是一个时代性命题。<sup>⑤</sup>在世界秩序的形成及“再谈判”进程中，国际组织处于核心位置。<sup>⑥</sup>世界各国能否以国际组织为“媒介”和“桥梁”，从分歧中寻求共识，如何处理共识与多元信仰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这些都有待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正在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凝聚共识、守望相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在国际秩序重建的窗口期抓住机遇，以国际组织为平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声音的影响力，在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进程中，推进重构符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根本利益的国际共识。

（责任编辑：彤 弓）

① “China Providing Care for Poor with HIV, AIDS”, *Deseret Morning News*, November 8, 2003.

② “China Reports Gains in Fighting Tuberculosi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5, 2014.

③ “Japan Hopes to Study Bird Flu Control Measures in China”, *Kyodo News*, March 16, 2004.

④ Martha Finnemore, “Legitimacy, Hypocris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Unipolarity”, *World Politics*, Vol.61, 2009, pp.58-85.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⑤ 何怀宏：《寻求共识——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读书》1996年第6期。

⑥ 马荣久：《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国际展望》2021年第4期。